



家庭情感与市场理性的动态平衡 ——《名利场》中的婚姻家庭观

黄若仪¹ 肖明文²

【摘要】《名利场》是一部再现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生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典之作。不同于将家庭的“有情”和市场的“无情”对立起来、并将前者作为道德基础和心灵归宿的同时代作家，萨克雷以同等批判的眼光审视家庭情感与市场理性，指出二者在父权社会中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一套以市场理性弥补虚幻情感、以家庭情感修复共通价值的婚姻家庭观。已有研究大多关注资本主义和传统婚姻家庭伦理的冲突，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双向互动。本文聚焦《名利场》中的婚姻家庭伦理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协调、冲突与互补，探究萨克雷是如何平衡家庭情感和市场理性，从而提出一套兼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中产阶级婚姻家庭观。

【关键词】《名利场》；威廉·萨克雷；市场理性；家庭情感；婚姻家庭观

-
- 1 黄若仪，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后殖民批评、饮食批评。邮箱：huangry36@mail2.sysu.edu.cn
 - 2 肖明文（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文学、西方文论、饮食批评。邮箱：xiaomw5@mail.sysu.edu.c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Family Affection and Market Rationality: The Viewpoint on Marriage and Family in *Vanity Fair*

Huang Ruoyi¹ Xiao Mingwen²

【 Abstract 】 *Vanity Fair* is a classic work that portrays the life of the 19th-century British middle class and capitalist society. In contrast to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juxtapose the “affection” of the family against the “coldness” of the market, positioning the former as a moral bedrock and spiritual refuge, Thackeray adopts an equally critical stance toward family affection and market rationality, pointing out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n this basis, he proposes a viewpoint on marriage and family where market rationality compensates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illusory emotions, and family affection repairs the destructed collective values. Most forme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ism and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neglecting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mutual interactions.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the coordination, conflict,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marriage-family ethics and capitalist values in *Vanity Fair*, examining how Thackeray balances family affection with market rationality to formulate a middle-class viewpoint on marriage and family that is both realistic and forward-thinking.

【 Keywords 】 *Vanity Fair*; William Thackeray; market rationality; family affection; viewpoint on marriage and family

-
- 1 Huang Ruo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nglish Literature,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Food Criticism. Email: huangry36@mail2.sysu.edu.cn
 - 2 Xiao Mingwen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Foreign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Food Criticism. Email: xiaomw5@mail.sysu.edu.cn



引言

《名利场》是英国作家威廉·萨克雷（1811-1863）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在书中，萨克雷着力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借叙述者之口，作家坦言：“我的书里面只有家常的琐碎”（萨克雷，1986，p. 60）。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传统的道德伦理观碰撞交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逐渐占据强势地位，使个体生活、家庭结构乃至社会文化都发生巨大改变（Harrison, 1973, pp. 132-3）。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将中产阶级描绘为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崛起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生活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社会”的社会意识（Wahrman, 1995, pp. 1-17）。因此，《名利场》中描绘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映射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主流观念，其呈现的婚姻家庭观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关注《名利场》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婚姻家庭书写的早期研究或分置两极，分别聚焦于萨克雷对商品文化的批判（Miller, 1995; Lindner, 2003）和对婚姻家庭的矛盾态度（Ray, 1952; Peters, 1987），未能针对这两个关键主题形成关联分析，或过度强调资本主义与传统婚姻家庭伦理的对立冲突（殷启平，2005; Nunokawa, 1994; Kent, 2008），忽略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和协调互动。与狄更斯等将家庭的“有情”与市场的“无情”对立起来的时代作者不同，萨克雷认为家庭和市场无法分离，共同服务于父权主义社会。同时，他对家庭情感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理性也并非一味的否定。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分析萨克雷对家庭情感和市场理性的批判态度，考察他如何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既用理性弥补情感的不可靠性，又用情感修复市场对共通价值的破坏，从而提出一套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婚姻家庭观。

一、以“父权”为根基：家庭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与双向互动

在 18-19 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市场逐渐替代家庭成为最主要的经济生产空间。为了将残酷的竞争世界隔离在温馨的家庭空间之外，人们主张在观念和行为上将家庭的私人空间与市场的公共空间分离（米特罗尔 & 西德尔，1987，p. 116）。这种分离主要通过“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实现，即将父亲推向外部市场，将母亲拘于家庭空间，并对子女实行差异化教育，通过保证“家庭天使”的不谙世事来保证家庭的纯洁性（Frader, 1998, p. 309）。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改造，不如说是根植在二者之中



的父权主义的共鸣。首先，英国社会乃至家庭都长期受到父权主义管辖，“父权制家庭被许多人视为文明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Perkin, 1993, p. 74）。父权在婚姻家庭伦理中具有一贯的权威，这从清教伦理对于婚姻家庭的教义中可以窥见一斑。《圣经》强调妻儿对父亲的绝对顺从，《以弗所书》训诫妻子：“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Ephesians* 5:22）；《歌罗西书》则对子女提出要求，劝诫他们“应当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Colossians* 3:18-20）。这种丈夫领导、妻儿从属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更为具体的延伸和更为深入的强化。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依赖、彼此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不仅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劳动力和再生产保障，还通过将女性的劳动私有化，从而限制女性的社会流动性和经济自主性，强化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占有和控制（Fraser, 2013）。家庭和市场的分离理想既是对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延伸，也满足了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需求，从家庭伦理对每个家庭成员职责的规定中，可以观察到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双向互动关系。

首先，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核心人物，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地位与其经济供养能力呈正相关，家庭空间的安全和完整也在极大程度上靠他维系。家庭伦理要求，称职的父亲必须努力挣钱，从而维持家庭的开销，保证妻子不用外出工作，为儿子的教育提供经费，为女儿积攒嫁妆。萨克雷借叙述者之口描绘的临终念头正是每个中产阶级父亲的终极理想：“我留给每个女儿一万镑，可算是很丰厚的嫁妆。我的碗盏器皿、家具、贝克街的房子，还有一笔很可观的遗产，都给我的太太终身使用。我的田产庄地、公债票、贝克街屋子的酒窖里面所有的好酒，都给我儿子”（萨克雷，1986，pp. 767-8）。经济能力足够强的父亲才能维护其家庭地位、保护家庭空间的完整性。父亲在市场中的失败则会使家庭失去将其与外部市场隔离开的边界。塞特笠老头破产后，拍卖会在他的家中举行，家庭空间受到市场的入侵，家庭资产变成在交易的货物。维护家庭地位、保障家庭安全、守护自身财产的焦虑感根植于父权主义，在赋予父亲权力的同时也要求其担负极大的责任。而这种焦虑同样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运行，因为它驱动父亲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产出，由此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当男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摸爬滚打时，女性被要求成为“家庭天使”，在家庭和市场都服从男性的统率。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宣扬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艺术作品赞美纯洁温顺、牺牲自我、拘于家中的妻子形象，书籍刊物宣称“家庭领域是女人展示其杰出才能的最好场所”（Banks & Ambrose, 1964, p. 60）。《名利场》中的爱米丽亚正是一位完美



的家庭天使。她纯洁善良、极具奉献精神，将生命的全部意义寄托在婚姻和家庭上，将丈夫作为自己的“主人”和“领袖”。以父权制度社会为背景，“家庭天使”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由父亲统率全局的传统家庭权力结构，还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运行。一方面，资产阶级将女性的活动区域局限于家庭，剥削其经济独立性和权利自主性，通过将其身体和劳动私有化来实现对其的彻底控制（Engels, 1972, pp. 87-88）。另一方面，“家庭天使”的所有能力和美德——从操持家务、养育儿女的能力到温顺的性格和丰富的感情——最终都是为了给父亲营造一个疗愈精神、维护劳动成果的家庭空间。温馨安全的家庭环境能帮助父亲尽快从工作造成的精神倦怠和情感创伤中恢复过来，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心态投身于下一轮市场竞争中，专注精力生育子女的母亲则能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家庭天使”巩固了传统家庭伦理中的权力秩序，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市场持续运作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基础。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中产阶级家庭伦理在子女教育中得到延续和加强，儿子和女儿接受差异化教育，学习成为未来丈夫和妻子所需的技能。一方面，从家教、公学、到大学，男孩从小接受高质量教育，学习继承家产、成就事业、建设社会的技能（Perkin, 1993, p. 26）。《名利场》中的中产阶级男性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例如，贵族出身的克劳莱兄弟就读于老牌私校伊顿中学，在长大后分别就读于牛津耶稣堂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些教育安排为中产阶级男性参与市场竞争和建立具有坚实物质基础的理想家庭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女性接受的大多是非正式的家庭教育或女校教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层阶级的女孩根本不上学，而是由管家和家教教导，直到十七岁‘出闺’步入‘社会’”（Perkin, 1993, p. 27）。这类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精于琴棋书画、刺绣女红、日常礼仪的未来妻子。在《名利场》的开篇，林荫道女校校长就在信中这样称赞“家庭天使”爱米丽亚：“她学习勤勉，性情和顺，博得师长们的赞扬，而且她为人温柔可亲，因此校内无论长幼，一致喜爱她。在音乐、舞蹈、拼法以及刺绣缝纫方面，她的造诣一定能副亲友的期望”（萨克雷，1986，p. 3）。在这种专门化教育的培养下，女性从思想和能力上都被进一步禁锢在家庭中，既没有跳出家庭的意识，也没有自主生存的技巧。由此，按照性别划分的子女教育巩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强化传统家庭伦理的权力结构，也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生产和劳动力再造。

围绕父权主义这一中心，维多利亚家庭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形成双向互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既强化了父亲统率、妻儿顺从的传统家庭关系，也保障了资本主义市

场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为了强化家庭和社会中的父权，家庭伦理要求各个家庭成员履行自己的职责，要求父亲提供充足的经济收入、母亲操持家务和养育儿女、子女从各自的教育中习得成为称职父母的技能。同时，这些要求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生产，为男性提供工作的有利条件，促使男性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家庭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双向互动帮助父权在家庭的私人空间和市场的公共空间之间形成流动和循环，并在物质和伦理道德层面都得到合理化和进一步加强。

二、“有情”的虚幻与“无情”的真实：市场理性对婚姻决策和道德判断的重塑

在以父亲为权力顶峰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家庭中，情感是家庭的必要的基础和因素。在残酷的市场中搏杀后，父亲要求家庭给他提供精神疗愈和情感慰藉（米特罗尔 & 西德尔，1987，p. 116）。然而，家庭情感的可靠性却受到萨克雷的质疑。首先，萨克雷本人持有较为矛盾的婚姻家庭观。一方面，童年经历使他信赖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抚慰力量：“一方面是幸福家庭圈子中的温暖与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外部世界的冷酷与漠然”（Ray，1952，pp. 7+14）。另一方面，萨克雷又对婚姻抱有现实主义态度，告诫人们：“最好还是不要爱上自己的妻子——只要对这位同床共枕、代付面包账单的女人怀有尊重与敬意就够了”（Thackeray，1945，pp. 266-7）。这种矛盾态度在《名利场》中得到充分体现。以利蓓加和爱米丽亚为代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无情”和“多情”的对立。萨克雷对前者的态度显然是否定的，利蓓加被物欲蒙蔽双眼，在情感上对丈夫虚与委蛇、对儿子冷漠无情，最终彻底破坏其家庭。然而，萨克雷对爱米丽亚的“多情”也并非全然肯定。爱米丽亚对乔治的情感占据心神、危及生命，还大多是基于她自己的幻想，凸显了情感的危险性和虚幻性。萨克雷犀利地指出，爱米的问题在于“不理智”：“她不该爱错了人，不该爱得那么热烈，不该让情感淹没了理智”（萨克雷，1986，p. 217）。为了平衡情感带来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萨克雷试图以市场理性介入基于情感的婚姻家庭伦理，探讨市场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保障个人决策、重塑道德伦理的作用。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语境中，市场理性通常被视为异化人性、分裂共性的罪魁祸首。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理性因其客观性和合理性而被推崇为一种可靠的判断标准。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分类，婚姻家庭伦理是一种价值理性，而资本主义市场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虽然二者都被称为理性，但前者“服务于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



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韦伯，1997，p. 89），按照非市场原则来分配经济利益，“可能以传统为取向，或者受到情绪的制约”（韦伯，1997，p. 128）。与此相对，后者有计划地统筹、分配和运用资源，强调目的、手段和效果的切实性，将效果最大化作为唯一原则（韦伯，1997，pp. 89+128）。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实现的关键在于“货币”的使用，这使行为的价值变得可以计算，从而变得具体。按照这种逻辑，以婚姻家庭伦理和情感为标准做出的决策显然不如基于“获得多少财富”等能靠货币计算的目的的理性标准做出的决策可靠。

在《名利场》中，纯粹基于情感的婚姻与投机生意形成巧妙的对照，二者都因为不符合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而惨遭失败。首先，热衷于投机生意的塞特笠老头在婚姻决策中也缺乏现实性考量。在做生意时，他不从商品质量、供销货渠道、法律责任等现实层面考量生意是否会成功。在婚姻决策中，他也不将结婚对象的资产作为判断的重要依据，而是强调“爱娶谁就娶谁”（萨克雷，1986，p. 61）的情感倾向。他不仅选择与贫穷的塞特笠太太结婚，在乔斯想娶身无分文的利蓓加时也毫不阻拦。这些“草率”的决定使他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地位，还使其家庭生活失去保障。这种以情感压过理性的决策风格在艾米丽亚的婚姻中得到延续，其不合理之处和不良后果也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名为“多情的和无情的”的第十三章中，萨克雷以市场理性的公平原则、契约精神和投资判断为标准，披露了基于情感的婚姻的不可靠性：“长期的订婚好像两个人合股做买卖，一方面倾其所有投资经商，另一方面却自由自在，守信由他，背约也由他”（萨克雷，1986，p. 219）。乔治对艾米丽亚的情感反复无常，艾米对乔治的一往情深也最终让位于对都宾的依赖，情感的易变性使其区别于“货币”的确定性，使基于情感的婚姻的价值、收益和后果都难以预计。最终，不遵循市场理性的婚姻决策使家庭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塞特笠老头的生意多次破产，负债累累，其家庭空间变成市场买卖的交易空间。艾米丽亚的婚姻则是先后受到订婚风波、战争、乔治的死亡、父亲的破产和都宾的追求的动摇，至始至终也未能拥有带给她心理安定或经济稳定的家庭环境。

以此为前提，萨克雷进一步讨论了市场理性作为道德基础的可靠性。首先，萨克雷并不认为任何形式的情感都可以被视作道德品质的真实体现，并深刻质疑“那些通常被置于公共与商业解释领域之外的表达形式——即家庭与私人生活中的亲密情感表达的地位”，他笔下的家庭情感通常带有表演性，与欲望混淆不清，使人难以分辨情感背后的真实动机和道德指向（Kent，2008，pp. 132-3）。作品中感情最为充沛的艾米丽亚在道德上仍然是



有缺陷的。她以自我为中心，一心沉浸于爱情，在家庭和社会遭受动荡时毫不关心，并且“寄生于”他人的情感回馈（Knoepfmacher, 1971, pp. 76-77）。与此同时，萨克雷对利蓓加“我想如果我有了五千镑一年的进款，也会做正经女人”（萨克雷，1986，p. 527）的宣言持同情和赞同态度。在利蓓加的畅想中，拥有五千镑不仅会让她回归家庭、体恤穷人，还会让她热心慈善与祷告。此时，数字具体、得失可计的“五千镑”不仅成为了做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称职妻子的前提条件，更是成为了正派、慈善、虔诚等美德的基础，与爱米丽亚捉摸不定的情感和含混不清的道德形成了鲜明对照。

与同时代的作者不同，萨克雷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在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中受到推崇的情感，冷静地审视其作为婚姻决策和道德判断的标准的可靠性。他与时俱进，结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提出纯粹基于爱情的婚姻与投机生意一样不可取，用客观实用的市场理性调和虚幻多变的家庭情感，从而使个人的婚姻决策和道德判断更加合理可靠，帮助个体和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最大利益和道德认可，同时更加有效地规避家庭破碎的风险。

三、“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道德困境：家庭情感对共通价值的修复

与家庭情感相似，资本主义市场理性在具有客观、实用等优点的同时也具有其缺陷。当行为过度受到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即势必会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的实质。把功利目标视为唯一目的，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使社会生活丧失多元价值的创造性”（苏国勋，2016，p. 91）。关注《名利场》中的商品文化对于个人、婚姻和家庭的异化的学术研究不胜枚举。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将人之间、社会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转化为物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人的物化和道德伦理的失落（Cole, 2006; Miller, 1995; Lindner, 2003; 殷启平, 2005）。同时，许多学者聚焦于情感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的修复作用，指出家庭情感具有平衡男女权力关系、遏制物质欲望、区分人与物等功能（Armstrong, 1987; Poovey, 1988; Nunokawa, 1994）。然而，已有研究却鲜少关注市场理性和家庭情感在另一个方面的冲突和调和，即前者对于共通价值的破坏和后者对此的修复。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替代为物与物之间的利益关系，维系共通价值的情感基础发生断裂，这不仅加剧社会竞争，使自私自利的恶习膨胀，还使人失去对集体的责任感，使从家庭至社会的共通价值遭到破坏。

萨克雷将自私视作“整个世界的主要驱动力”（Thackeray, 1945, p. 357），在《名利



场》中，他着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风气。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私”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化和鼓吹，演变为一种强调个人利益和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Morton, 1938, p. 380）。加拿大学者麦克弗森指出：17 到 19 世纪之间的英国政治思想存在一种他称之为“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统一性（2018, p. xxi）。这种个人主义的占有性认为：“个人既不被视为一个道德整体，也不被视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被视为他自己的所有人”（麦克弗森，2018, p. 3）。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将情感关系替换为交易关系，并将集体责任从个人身上摘除，破坏了维系共通价值的人际联系和道德基础。在受到占有性个人主义影响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首要任务不是联络亲情，而是“占有”——大依芙斯勋爵的儿子在他尸骨未凉时就开始拍卖他的家产；毕脱·克劳莱听到父亲去世的第一反应是为自己即将继承家产而兴奋得脸红。通过将亲属关系异化为竞争关系，占有性个人主义破坏中产阶级家庭的情感联系，使成员之间互相关心、分担责任的核心家庭解体。个体失去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与道德约束，更加彻底地暴露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

同时，通过抹除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占有性个人主义进一步拆解共通价值。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人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强调家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18 世纪英国的女性期刊《淑女杂志》（*The Lady's Magazine*）曾劝诫读者：“婚姻的目的不是让男人和他妻子始终彼此亲密，而是合起来履行公民社会的任务，谨慎地管理他们的家庭，审慎地教育他们的子女”（Stone, 1990, p. 59）。这样的家庭观倡导个体承担起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通过在家庭中遵循道德规范、履行应有义务来助力社会和国家的道德建设和凝聚力形成。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受到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破坏。麦克弗森在其作中反复提到，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个人在经济和道德上对社会不负有责任，不受共通价值观的制约：“个人既不被视为一个道德整体，也不被视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被视为他自己的所有人”；“个人是他自己人身的所有者，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2018, pp. 3+269）。当面对利己和利他的抉择时，维多利亚家庭伦理要求个体即使牺牲自我也要承担起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占有性个人主义则只关注个体利益，不要求个体为建设家庭或社会共通价值付出努力。

在《名利场》中，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争端和集体责任意识缺失。占有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弊端在于其导致“一系列所有人之间的竞争性和攻击性关系”（麦克弗森，2018, p. 272）。在家庭中，它激化个体矛盾，使克劳莱的家庭成员为了占取私利



反目成仇。同时，在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家庭伦理所强调的家族观念让位给个人对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忽视建设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一心只为独占私利钻营。利蓓加不做家务、不关心丈夫和儿子，全副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利益上。继承了大部分家产的毕脱找各种理由推脱，拒绝接济兄弟和亲属。家庭中的情感淡漠和道德失衡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共通价值的凝聚力衰退。在开拔到比利时后，英国军士们架起的不是练兵场，而是穷奢极乐的名利场。作为军官的妻子，爱米丽亚不关心战况，不在乎国运，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利蓓加在战前战后只顾名利，忙于在名利场中为自己收集爱慕者和随之而来的财富。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下，个人不再将自己视为家庭与社会结构的一环，情感联系和道德准则让位于利益关系和个人欲望，个人不再为他人或集体牺牲自己，这使共通价值受到根本性动摇。

为了应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对于共通价值的破坏，萨克雷转回情感。他将“描写真实、宣扬仁爱”作为写作的终极目标（Thackeray, 1869, p. 240），从以“求真”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转回以“求善”为目标的价值理性。在批判情感的虚幻和脆弱之余，他仍然坚信真实情感的伟大力量。在写给卡米凯尔·史密斯夫人的一封信中，萨克雷坦言：爱米丽亚的特殊之处在于“爱——凭借这份爱，她将得到救赎”（Thackeray, 1945, p. 309）。在《名利场》中，真切的感情对于共通价值的积极力量在奥多太太这一角色身上得到最明确的体现。奥多太太和蔼可亲，真心待人，将军营成员当作家人，在军队或国家遭遇危机时挺身而出。与只顾自身利益、忽略公共责任的个体不同，奥多太太热衷于与身边人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主动地承担起关心他人、照顾弱者的责任。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奥多太太的情感付出维系和加强了家庭、军队乃至国家的共通价值，使个体在危难关头团结到一处，承担起保护国家和建设社会的责任。爱米丽亚的丈夫战死，奥多太太的丈夫却凯旋，还因为战功而加官晋爵。在此，情感浅薄的婚姻的失败与情感亲密的婚姻的成功再次形成了隐喻性的对比，凸显了情感对于维护家庭乃至国家命运共通价值的重要意义。

过度资本主义市场理性会导致人情的淡漠和个人主义的突起。为了调节这种情况，萨克雷诉诸真实情感对于共通价值的维系功能。针对只顾自身利益、罔顾家国责任的个人主义取向，萨克雷引入以“将身处一个集体的人看作家人”的家庭情感，从而缓解个人主义在家庭和社会激发的激烈竞争和责任感缺失，从而使婚姻家庭观有利于个人的道德成长和宏观的社会建设。



四、结语

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指出, 合格的“讽刺家”通过不断挖掘和重估事物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对既有的现实观念、自我认知以及他者认知展开探究 (1989, pp. 23-6)。在《名利场》中, 萨克雷正是以一种“讽刺家”的姿态, 以批判性的眼光探讨所有事物的两面性, 审视它们的演变与革新, 从而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重构意义: “他的叙事往往融合了探询与暂时性的断言, 呈现出一种启发式的风格, 其目的在于重新评估人类行动的意义” (Fletcher, 1991, p. 385)。《名利场》刻画的婚姻家庭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也呈现一种不断冲突、交融和流变的样态。萨克雷在家庭情感和市场理性之间调和, 探讨出一套利于个人和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和壮大、并且获得道德成长的婚姻家庭观。针对二者的优缺点, 萨克雷没有提出绝对的价值判断, 也没有塑造权威的道德范式或社会框架, 而是在二者的互动中探索情感与理性的平衡, 从而探讨人如何在所处社会中做出合理的道德决策与实践, 激发读者对于生活、伦理与社会结构的持续反思。这种对于“不确定”的探索既体现了萨克雷作为现实主义讽刺家的思想使命, 也表现出他对现代社会中个体行为与道德选择的深切关注与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 马克思·韦伯著, 林荣远译. (1997). 经济与社会 (上卷)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ume I)*].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迈克尔·米特罗尔 & 赖因哈德·西德尔著, 赵世玲, 赵世瑜 & 周尚意译. (1987). 欧洲家庭史 [*The European Family: Patriarchy to Partnership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麦克弗森著, 张传玺译. (2018).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 从霍布斯到洛克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萨克雷著, 杨必译. (1986). 名利场 [*Vanity Fair*].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苏国勋. (2016).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Ration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An Introduction to Max Weber*].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殷企平. (2005). “进步”浪潮中的商品泡沫: 《名利场》的启示 [*Commodity Bubbles on the Waves of “Progress”: A Revelation of Vanity Fair*].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3), 81-87+172-173.



- Armstrong, N. (1987).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nks O., & Ambrose, J. (1964). *Feminism and Family Planning in Victoria Engl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M. (1999). Sentimental Communities. In M. Cohen & C. Dever (Eds.), *The Sentimental Education of the Novel* (pp. 106-13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e, S. R. (2006). The Aristocrat in the Mirror: Male Vanity and Bourgeois Desire in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s *Vanity Fair*.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61(2), 137-70.
- Engels, F. (1972).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 Fletcher, R. P. (1991). The Dandy and the Foggy: Thackeray and the Aesthetics/Ethics of the Literary Pragmatist. *ELH*, 58(2), 383-404.
- Frader, L. (1998).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t Economy. In R. Bridenthal, S. M. Renate, & M. E. Wiesner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3rd ed.) (pp. 309-333).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Fraser, N. (2013).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Verso.
- Harrison, J. (1973).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Industrial England 1714-1867*.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Kent, J. (2008). Thackeray's "Marriage Country": The Englishness of Domestic Sentiment in *Vanity Fair*.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30(2), 127-145.
- Knoepfmacher, U. C. (1971). *Laughter and Despair: Readings in Ten Novels of the Victorian E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dner, C. (2003). *Fictions of Commodity Culture: From the Victorian to the Postmoder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Miller, A. H. (1995). *Novels Behind Glass: Commodity Culture and Victorian Narra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A. (1938).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Nunokawa, J. (1994). *The Afterlife of Property: Domestic Securit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 J. (1993). *Victorian Women*. John Murray.
- Peters, C. (1987). *Thackeray's Universe: Shifting Worlds of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ovey, M. (1988).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y, G. N. (1952). *The Buried Lif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ackeray's Fiction and His Pers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L. (1990). *Road to Divorce: England, 1530-198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ackeray, W. (1945). *The Papers and Private Letter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Volume I: 1817-184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ackeray, W. (1945). *The Papers and Private Letter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Volume II: 1811-186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ackeray, W. (1869). *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Volume 15*. Smith, Elder & Company.
-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2001). Crossway Bibles.
- Wahrman, D. (1995). *Imag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 c. 178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编：王儒蕴)